

研究論文

社會變遷、媒體互動，以及電台聽眾參與節目在香港的演變

李立峯
鄧鍵一

摘要

在香港，容許聽眾打電話到電台，就公共事務進行討論的聽眾參與節目 (audience participation talk show) 已有數十年的歷史。在1997年主權移交前後，這類型節目更成為香港大眾媒介中的一個亮點，對社會輿論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從六十年代後期到現在，這類型節目在不同時期的香港社會其實扮演著頗不一樣的角色。本文旨在回顧電台聽眾參與節目在香港的發展。在理論層面，本文建構一個強調媒介與社會變遷、媒介與政治行動者、不同媒體之間，以至同類型媒體之間多重互動的分析框架，探討媒體發展和社會政治變遷之間的關係。我們的分析將聽眾參與節目在香港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這些節目先以制度化的官民溝通渠道出現，繼而轉化為公共討論平台，再於回歸前後成為了批判和監察功能特別顯著的「烽煙節目」。但在近年，聽眾參與

李立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興趣：政治傳播、新聞研究、民意研究。電郵：francis_lee@cuhk.edu.hk

鄧鍵一，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研究興趣：公共論述、政治傳播、香港政治。電郵：garytangky@cuhk.edu.hk

論文投稿日期：2011年8月15日。論文接受日期：2011年11月8日。

節目的批判性減低，一些作為官員「問責表演」平台的節目變為較受關注。這些演變跟香港的政治和社會變遷息息相關。但在每一階段，發揮影響的力量並不一樣。媒體演變可以直接由宏觀變遷導致，也可以由個別媒體的出現和媒體間的互動「由下而上」地推動。

關鍵詞：電台聽眾參與節目、社會變遷、媒體互動、民意政治、歷史分析

Social Transformation, Media Interactions, 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udience Participation Radio Talk Shows in Hong Kong

Francis L. F. LEE

Gary TANG

Abstract

In Hong Kong, audience participation radio talk shows on public affairs have existed for decades. Historically, such shows have played differ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roles in the city.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udience participation radio talk shows. More importantly, it constructs a “multi-level interaction model”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cro-level socio-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specific media type. The model considers the relationship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following: 1) media and social political structures, 2) media and other social and political actors, 3) different types of media, and 4) different media outlets of the same type.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audience participation shows emerged as an institution for official-citizen communication. They then mutated into a public forum in the 1980s, and then became a watchdog medium with significant monitoring and critical functions in the late 1990s. After 2004, the criticalness of

Francis L. F. LE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studies, and public opinion studies

Gary TANG (PhD stud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 public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politics

audience participation talk shows declined. The more prominent radio shows often serve as platforms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accountability performance." We also contend that, at different stag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udience participation radio talk shows can begin at different levels. Sometimes transformation begins with macro-level changes, but it can also be driven by more micro-level dynamics.

Keywords: radio talk shows, social change, media interactions, public opinion, historical analysis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Lee, F. L. F., Tang, G. (2013). Social transformation, media interactions, 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udience participation radio talk shows in Hong Kong.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4, 23-60.

引言

在香港，容許聽眾打電話到電台，就著公共事務、民生問題，和政府政策跟主持人以及嘉賓進行討論的聽眾參與節目 (audience participation talk show) 已經有數十年歷史。在1997年主權移交前後，這類型節目更成為香港大眾媒介中的一個亮點，吸引了不少學者的關注和研究 (Lee, 2002, 2007; Ma & Chan, 2007; So & Lee, 2007)。香港媒介在過去十幾年來多以「烽煙節目」來指向這種以公共事務為題材的聽眾參與節目，取其發音與 phone-in 相近之餘，亦取其「烽煙四起」之意。在2003年初沙士疫情期間，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缺乏信心，當時極受歡迎的電台節目主持人鄭經翰在其早晨節目中一方面狠批政府，另一方面發動如籌募口罩等「民間自救」行動，被傳媒稱為「十點前特首」，¹ 烽煙節目的社會影響達至一個高峰。

不過，聽眾參與節目的影響力並非天生使然。從六十年代後期到現在，這類型節目在不同時期的香港社會扮演著頗不一樣的角色，節目的內容和風格亦有所轉變。這些轉變跟不同時期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事實上，電台聽眾參與節目與「烽煙四起」之間的聯想，本身就有其社會和政治條件。因此，本文用沒有太多隱含意義的簡稱「聽眾節目」來代表讓市民直接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電台節目，² 「烽煙節目」則代表於某一時期中出現，展現出某種獨特風格的聽眾節目。而本文的要旨之一，就是回顧電台聽眾節目在香港的發展，分析其演變，並勾勒出在歷史脈絡中聽眾節目和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

在理論層面，本文希望通過分析香港的電台聽眾節目，展示社會變遷和媒介生態之間可能出現的錯綜複雜的關係。重大的社會變遷固然對媒介有深遠的影響，但實際的影響包括甚麼、怎樣發生和何時發生，卻可以取決於其他因素。同時，聽眾節目只是媒介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社會變遷對聽眾節目有甚麼影響，應取決於在轉變的環境中，媒體系統和其他主要行動者 (如政府、社會團體等) 如何互動，以及媒體系統內的不同組成部分如何互動。而這些互動過程，更有可能反過來影響社會和政治變遷。

所以，除了作歷史回顧外，本文亦旨在建立及展示一個可用於探

究社會變遷下個別媒體發展的分析框架。而下文亦會先討論這個分析框架。然後，我們會簡單介紹本研究的資料來源，再正式對香港的電台聽眾節目進行歷史分析。

社會變遷下的媒體互動發展

在分析媒介和社會政治環境的關係時，很多學者都會先著眼於後者對前者的影響。正如李立峰與陳韜文(Lee & Chan, 2009a) 在回顧香港政治傳播學研究時指出，不少八十及九十年代對香港媒介和政治變遷的分析，都會明言或不明言地將政治權力結構視為「自變項」，而媒介角色、內容和行為等則是「依變項」。

的確，從批判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傳播媒介嵌入於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當中，權力擁有者可通過不同方法籠絡媒體，建制的掌控者亦握有大量傳媒所需的訊息和資源，同時亦是新聞媒介最重要的消息來源。種種原因，使得主流傳媒會出現對建制的偏向(Bagdikian, 2000; Gans, 1980; McChesney, 1997; Murdock & Golding, 1982; Tuchman, 1978)。當權力轉移的時候，傳媒的偏向便很可能轉變。陳韜文和李金銓對八十年代香港報章「範式轉移」的研究，便是一個很好的案例(Chan & Lee, 1991)。

除了政治經濟學之外，新聞媒介亦有一強烈的「本土傾向」(local orientation) (Chan & Lee, 2011)。對世界上絕大部分傳媒來說，無論是它們所服務的公眾抑或是所要爭奪的市場，都是一個有地域界限的東西。所以，新聞工作跟其所服務的「本土公眾」的基本需要、身份認同、文化常識，以至生活模式等都有緊密的關連。如果社會本身出現重大轉變，傳播媒介也會有所反應。例如香港傳媒在七十年代開始逐漸重視本地新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當時香港市民的本土意識和本土身份認同漸強所致。

作為動因，宏觀的政治社會變遷可能會導致媒介朝著某一方轉變。作為社會條件(social condition)，宏觀的改變可以使一些新的媒介現象的出現成為可能。不過，宏觀層次的變遷和媒介的轉變並不存在著一種單一和必然的對應關係。至少有兩方面的因素使我們不應接受

簡單的「宏觀決定論」。第一，媒介的轉變受著多方面因素左右。以香港為例，以上提及到在香港回歸前後，傳媒向新權力中心靠攏的現象，但商業媒體的市場考慮和新聞工作者的專業主義，亦成為了抵抗這趨勢的力量(Chan & Lee, 2008; Lai, 2005)。從概念上而言，所謂宏觀的社會變遷本身就可以是一個複雜和充滿矛盾的過程，新的社會或政治制度往往要跟既有的制度和文化並存，不同力量可能推動著媒介往不同方向發展。

第二，直接影響新聞媒介運作的，始終是社會上的各種機構和行動者。同時，新聞工作者亦有能動性，能發展出應對環境轉變的策略(李立峰, 2007)。所以我們要關注的，亦包括社會行動者和傳媒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行動者和新聞工作者如何互動。在較具體的層次，媒介的發展就是由這種傳媒和社會行動者之間的互動所推動。當然，社會上各行動者(包括傳媒和新聞工作者)的策略和行為，會受到宏觀的社會變遷左右。宏觀的社會變遷往往涉及資源和權力的再分配，以及新的誘因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的出現。當誘因結構和手上的權力與資源改變之後，行動者自然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和策略。但社會行動者在行為及策略上的轉變，卻不一定由宏觀的變遷觸發。所以，傳媒和其他行動者的動態互動，並不只是宏觀社會和政治經濟結構的結果而已。

以上的討論集中在媒介和社會環境之間以及媒介和非媒體行動者之間的關係和互動。但媒介並不是一個單一的實體。媒介系統有不同的組成部分，如果我們要了解媒介系統中其中一個組成部分的社會和政治功能，我們就要了解它和媒介系統中其他部分的關係。就以電台聽眾節目為例。這類型節目在九十年代初於美國大行其道。根據傳播學者James Carey (1993)的分析，這是因為美國民眾對主流傳媒的「資訊式新聞」(journalism of information)感到厭倦，開始尋找一種「對話式新聞」(journalism of conversation)。而Kathleen Jamieson和Joseph Cappella的分析，則將美國最受歡迎的幾個極具保守主義色彩的電台聽眾節目，與《華爾街日報》及霍士新聞網絡連在一起。兩位學者指出，這些媒體形成了一個保守主義的「迴音廊」，對美國的政治生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Jamieson & Cappella, 2008)。Jamieson和Cappella以及

Carey的分析雖然有不同的重點，但他們都著重電台聽眾節目和其他媒介之間的關係。

理論上，相對於擁有最多受眾的主流電視台和報章而言，電台聽眾節目可以是一種「另類媒介」(alternative media) (Couldry & Curran, 2003)，也可以是一種補足性(supplementary)的媒介。在不同的時空，主流新聞媒介和電台聽眾節目的關係可以或強或弱，或好或壞。過去不少有關電台聽眾節目或其他新媒體的研究都指出，一些受眾人數較少的媒體能否產生大的社會影響，往往取決於主流傳媒會否及如何轉載其內容(Page & Tannenbaum, 1996; Zaller & Hunt, 1994, 1995)。換句話說，一個媒體的社會政治效應會部分地取決於其他媒體會否扮演「再中介者」(remediator)和揚聲器(amplifier)的角色，使其部分內容在社會上有更廣泛的流傳和影響。

最後，我們亦要關注同類型媒體之間的關係和互動。同類型的媒體之間，如報章與報章之間或各電台聽眾節目之間，會有著較為直接的競爭關係。這裏的競爭可以指市場競爭，也可以指地位和影響力等較具象徵意義的競爭。再以電台聽眾節目為例，當一個電台製作了一個受歡迎的聽眾節目時，其他電台就需要有所回應。在概念上而言，回應的策略可以籠統地分為「同化」(assimilation)或「分化」(differentiation)兩種。同化就是去借用別人的成功模式，分化就是要突顯自己的節目內容或風格與眾不同。在進行市場競爭時，前者是跟對手在同一市場中直接比拼的策略，後者是嘗試將市場分割的策略。

在現實中，一個媒體的策略可能同時包含同化和分化，即一方面部分地採納競爭對手的一些成功要素，但同時嘗試保持自己的獨特性。媒體經濟學者對傳媒的「產品分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問題有不少分析(Albarran, 2002; Croteau & Hoynes, 2001)。一個媒體會採用那一種策略，會受著多方面因素影響，包括媒體的品牌形象、在專業理念上的定位、擁有的資源、媒體機構本身的龐複程度，以及某類型媒體的市場結構等。雖然本研究並不強調經濟學或市場學的分析角度，但同類型媒體之間的競爭和互動，是不能被忽略的一環。

總括而言，本文在分析香港的電台聽眾節目的演變時，會關注四個分析層次：一、宏觀社會及政治變遷和媒介系統的轉變之間的關

係；二、媒介系統和社會上的其他機構和行動者如何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進行互動；三、媒體系統內部不同組成部分之間的關係；四、同類型媒體之間的關係和相互影響。我們在概念上對這四個層次作出區分，而在這四個分析層次之間的關係上，本研究的框架強調三點。首先，在實際運作上，這四個層次是環環相扣的，其中宏觀社會政治變遷始終有著較大的影響力。我們可以說，四個層次之間有著「上層」和「下層」的關係，宏觀的社會及政治變遷在最上層，而同類型媒體之間的相互影響在最下層。當這樣排列時，上層的狀況對下層的狀況應該會有較大影響。例如當政治權力結構有重大改變時，社會上不同的行動者，包括傳媒本身，都要作出某些相應的改變，所以宏觀的社會變遷會影響到傳媒和不同社會行動者之間如何互動，而後者又可以影響到媒體內部不同組成部分之間如何互動。

不過，我們同時強調不同層次的「相對獨立性」，亦即是說，每一個層次的狀況並不完全由上一層的狀況來決定。如以上的討論指出，權力結構的變遷會使傳媒和政府的互動出現變化，但由於宏觀層次的變遷可以是複雜和矛盾的，所以傳媒和政府的互動到底會如何變化，並不完全由宏觀因素斷定。另外，就算當上一層的狀況沒有出現改變時，某一層次中的狀況也可因一些偶然因素而出現轉變。例如政府和傳媒的互動可以因為一位新領導人上台而起變化，不同媒體之間的關係亦可能因一個新的傳媒機構出現而改變。

既然每一層次的狀況可以相對獨立，那麼也可能出現由下而上的影響力。舉例說，同類型媒體的互動可以影響到該類型媒體的風格和特色，而這就可能影響到該類型媒體和其他媒體之間的關係，並因而進一步影響到媒體和其他社會行動者之間的關係。這裏需要再次指出，相對於由上而下的影響力，由下而上的影響力會較為有限。媒體之間的互動大概難以對特別重大的宏觀社會和政治結構問題（如香港回歸）產生具體影響。但媒體之間的互動以及媒體與其他社會行動者之間的關係，卻的確可能對另一些較為局部的宏觀結構問題（如香港現今的民主進程）有影響力。當然，這裏所談的影響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而已。我們需要經驗研究來展示這種由下而上的影響的存在。

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

本研究從多方面搜集相關資料。首先，在論述香港過去數十年的政治社會變遷和媒介系統的整體發展時，我們主要依靠現有的學術文獻和政府的檔案文件。而在論述電台媒介以至聽眾節目的發展時，我們會參考一些資深傳媒工作者的著作以及電台機構自己的出版物。但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對近20位電台工作者進行深度訪談。這些受訪者包括從七十或八十年代已參與電台工作的資深傳媒人，亦包括較年青的傳媒工作者。受訪者包括管理階層人士，亦包括一些較前線的員工。深度訪談的內容因應受訪者的身份而有所不同，每個訪問的長度由一小時至兩小時不等。最後，在論述較近年的狀況時，我們亦會引用各種我們能接觸到的研究材料。總括來說，我們並不局限於單一方法尋找資料，而是通過檔案、過往的學術研究材料，以及第一手的深度訪談，來重構電台聽眾節目的發展軌迹。

在搜集和分析資料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電台聽眾節目在香港的發展可被分為四個階段。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是第一階段。在這時期，聽眾節目是制度化的官民溝通渠道，處理的是市民生活上的具體問題。但自八十年代中，聽眾節目開始成為時事討論平台。到了九十年代，聽眾節目的批判和監察功能越益顯著，開始變得「烽煙四起」。最後，從2004年開始，聽眾節目的「烽煙」性質減弱，有官員或其他重要新聞人物出席作為嘉賓的聽眾節目變得較受社會關注。

值得在這裏說明，我們視歷史分析為一種詮釋性的建構。所以，以上的四個階段是一種分析性的劃分。在現實中，階段與階段之間的分界點不一定清晰。但我們認為以上的階段化 (periodization) 有助我們突顯出香港的社會變遷、媒體互動，和聽眾節目發展之間的關係。因此，下文會對每一個階段分別作出討論。同時，雖然我們強調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可以相互影響，但為清晰起見，我們在分析每一階段時都會先從宏觀層次出發。在完成對每一個階段的分析時，我們才會就一些較為理論性的問題再作總結和討論。

1969至1984：低度整合社會中的官民溝通渠道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六十年初的香港，基本上是一個難民社會。在1945至1951年間，香港人口從約50萬人激增至236萬人(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2: 23)。換言之，戰後香港的人口組成，結構上就是由外來難民和移民組成的社會。即使到了1961年，香港土生人口的比例仍只得47.7%(Sit, 1981)。當時，大部分人只視香港為一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Hughes, 1968)。他們既對香港沒有歸屬感，也沒有期望政府提供援助，市民傾向依靠社會網絡中的資源來解決問題(Lau, 1982)。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自然也不會熱衷於政治。在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也沒有動機由上而下地介入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經濟活動。如此一來，政治系統和社會系統不謀而合，造就了社會學者劉兆佳所形容的「低度整合的政治社會系統」(minimally integrated social political system) (Lau, 1982)。

但六十年代中，香港社會內部日趨尖銳的矛盾，加上國內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導致香港於1966和1967年爆發了兩次大規模的騷亂。當中，衝著殖民政府管治而來的「六七暴動」，對香港的影響尤其深遠。六七暴動令港英政府意識到有需要改變以往的管治方式。《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1967)就指出改善官民溝通是政府改革的重點。結果，一系列的新政策和措施紛紛出台。如1968年，政府參照新界理民府的制度，³在市區推行民政事務主任制度(City District Officer scheme)。民政事務主任在地區層面處理政治問題，主要工作包括「盡可能與區內市民建立聯繫」、評估「政策整體成效」和「跟市民解釋政策，及政府的困難與成就」(Tsang, 2004: 190)。

此外，為加強掌握民情的能力，政府又擴大諮詢委員會架構(馬嶽，2010：9)。民生方面，港英政府大幅擴展公共房屋、推行九年免費教育，並改善勞工權益。政府於六七暴動後的各種舉措，加上香港的經濟發展，使香港人身分開始萌芽(Baker, 1983)。更重要的是，政府擴張公共服務，間接介入了市民生活，於是乎成為了一個跟市民交流的實體，再非一個「山高皇帝遠」的政權。

另一方面，暴動期間左派陣營到處放真假炸彈，令市民日常生活

大受影響，不再對他們寄予同情，「平亂有功」的港英政權的管治正當性反而有所提升(Scott, 1989)。換句話說，暴動後的一段時間，香港左派幾乎和香港的主流社會脫節，而以往從社會內部到媒介的左派右派爭逐，也因此失去了基礎(Cheung, 2009)。

早期的香港傳媒生態和香港電台

如上所述，六七暴動後，香港的社會形態和殖民政府的管治策略都出現了根本的轉變。而這種轉變，也帶動到媒介生態的變化，並正好成為電台聽眾節目萌芽的土壤。

戰後初期至六十年代，香港的媒介並沒有一種強烈的意志去追求代表社會上哪個群體。地緣政治上，香港作為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進行意識形態交鋒的一個主要平台，它承載了各種備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媒介產物。然而，這些意識形態爭論所針對的，都圍繞著中國政治，而非香港的本土問題(Chan & Lee, 1984, 1991)。在社會層面，港英政府也不太干預民間的媒介操作，也沒有由上而下進行政治宣傳。大部分時間，本港媒介和政治都屬於河水不犯井水的狀況，關信基和劉兆佳將此形容為「低度整合的媒介政治系統」(minimally integrated media political system)(Kuan & Lau, 1988)。然而，由於這種百花齊放的景象乃於不影響殖民地統治的前提下才得以滋長，因此也被稱為「制約多元主義」(controlled pluralism)(Ma, 2007)。

正如上文提到，六七暴動驅使港英政府開始重視官民溝通。當中，媒介工作是一個重要的執行平台。政府新聞處(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成為統籌和發布政府新聞資訊的渠道。在七十年代，由於香港報章用作採訪本地新聞的資源相當有限，政府新聞處便成為了本地新聞的主導來源(Lee, 1985)。李金銓和陳韜文甚至認為，政府新聞處擔當了殖民地政府在意識形態上統馭香港的代理人(Lee & Chan, 1990)。

另一方面，政府也開始利用媒介掌握民情和介入民間討論。香港電台(簡稱港台)作為政府部門，順理成章擔此重任。香港電台的前身是香港無線電學會，於1928年由一班無線電業餘愛好者成立，至1939

年由政府接管，列入政府編制。最早期的時候，香港電台主要擔當政府的喉舌(梁麗娟，2007)。但到了六十年代，當時來自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廣播處長布祿士(Donald Brooks)為港台爭取向公共廣播轉型，並開始製作一些面向群眾的文化及娛樂節目。在1969年，布祿士更提出香港電台應該自行製作新聞節目，並向政府新聞處交涉，問港台是否可以自行製作新聞。政府新聞處的回覆是：「不是不可以，不過我恐怕你們力有不逮，因為我們有數十年的新聞經驗。」(韋佩文等，2004，頁90)結果，政府從新聞處借調人員至香港電台，協助成立香港電台新聞部。七十年代，政府新聞處的人員撤出，讓港台新聞自主。自六十和七十年代開始，港台雖然身為政府部門，但在理念上則強調仿倣英國廣播公司，力求自主，貼近民情。到了七十和八十年代，不少香港電台的高層都曾經在BBC工作，促進了港台內部的公共廣播文化(Cheung, 1997; 梁麗娟，2007)。

不過，布祿士爭取把香港電台轉為公營廣播機構並未算成功(張圭陽，2006)。港台在七十年代的發展，大致上仍配合著政府本身的改革綱領。所以，港台在七十年代製作的跟社會和時事相關的節目，大都強調官民通訊。如1974年，香港電台推出電視時事節目《針鋒相對》，每集邀請嘉賓分享意見，觀眾亦可以在現場或透過電話發表意見。此外，七十年代出現的《警訊》、《奉告》，和《城市論壇》等，都是官民通訊的重要渠道。

電台聽眾節目的出現

電台聽眾節目正是在以上論述的背景下出現。當時，雖然政府開始重視回應民意，但操作上，市民跟政府之間的溝通仍有隔閡。資深電台工作者勞浩榮和吳明林分別提到，那時候大部分市民仍看待政府部門為「官府」，「生不入官門」的傳統思想令市民若非必要都不會親身前往查詢資訊或作出投訴。另一方面，即使他們到政府部門求助，由於不諳與官僚溝通，往往不得要領。當時市民有投訴上要達，最有效的方發唯有寫信到英文報章《南華早報》，但那時候香港華人的整體教育水平仍然偏低，這個途徑對很多市民來說其實形同虛設。⁴

根據港台刊物《一起廣播的日子》(2009)的描述，1969年的《電話說心聲》是最早的電台聽眾節目。該節目逢週五晚上11時播出，是考慮到星期五晚官員和市民的心情都較輕鬆，也能展現官員勤於政務。節目會邀請一位政府官員負責解答市民的查詢。當時最多獲邀的是徙置事務處。此外，民政處、勞工處、警務處、入境處都是常被邀請的部門。內容方面以民生問題為主，例如投訴徙置區的不足、詢問甚麼時候可以「上樓」(即搬至公共房屋居住)、投訴哪一區有很多垃圾、尋找失蹤人口等等。就聽眾的投訴或詢問，主持人和嘉賓官員會盡量即時作答，或協助轉介予相關部門處理。到七十年代初，香港電台推出新節目《太平山下漫步》。內容同樣以處理市民查詢和投訴為主，但節目時間則改為星期一至五的工作天早上，方便官員在遇到自己負責範圍以外的查詢或投訴時，可以馬上轉介予其他部門跟進。偶爾，主持人若無法找到其他負責官員答話，會在節目中說出有關部門的直線電話，讓市民直接查問。

節目時間的改動，使政府能更有效回應市民的訴求。吳明林形容，如果投訴能在一星期內處理，已經十分有效率，但最重要的是，至少市民的投訴有人理會。所以，出席這些節目的官員其實並不特別高級，多數是不同部門的新聞主任。在個別情況下，例如失蹤人口、過年回鄉安排等問題，相關部門的高級督察、總入境主任會出席講解。另外，勞浩榮也提到，經常出席聽眾節目的，差不多是同一批政府官員，他們會過問之前的投訴處理得怎樣，這也是電台監督政府的一部分。

《電話說心聲》和《太平山下漫步》是電台聽眾節目的先鋒，但從政府策略的角度看，這些節目可以說是以上提及過的民政事務主任制度的延伸。值得指出的是，《電話說心聲》這個節目名稱本身，溫柔婉約，感覺是官員和市民像朋友一般，深宵促膝詳談。同樣，《大平山下漫步》這名稱，營造的也是一個較輕鬆的調子，和下文將會談到的九十年代一些「烽煙節目」的名稱可說是南轅北轍。

總而言之，電台聽眾參與節目出現於六十年代末，很大程度上是宏觀的政治社會因素使然，而香港電台的角色轉變，其內在人事的推動，固然亦有其角色，但更重要的是，它的轉變契合了當時港英政府

的管治議程。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銳意加強官民溝通，改善市民福利。這個改變，令港英政府開始變為一個公共服務提供者和一個有形的訴求對象。縱使聽眾關心的仍然是跟個人生活直接相關的事項，但至少香港市民已經不再凡事只會向身旁親友求助，「公共」意識開始在包括電台聽眾節目等不同的平台中醞釀。

1985至1995：走向時事討論平台

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確定了香港將於1997年回歸中國。當時的香港社會，一方面醞釀著大規模的移民潮 (Skeldon, 1995)。另一方面，打算留港的市民，面對一個不可知的將來，都不得不認真地思考這個城市的未來。於是，大大小小的論政團體紛紛湧現。可以說，《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使香港社會急速地政治化。

隨著英國在香港的管治進入倒數階段，英國政府決定在香港引進民主制度，以助維持在過渡期間管治的合法性 (legitimacy)。港英政府在1984年發表《代議政制白皮書》，嘗試於1988年局部啟動香港政制民主化。此舉引起中國政府強硬回應。在中方施壓下，「八八直選」的建議雖然得到廣泛民意支持，最終仍被收回。縱然如此，「八八直選」的建議在香港社會牽起各種討論，民主派和保守派兩個陣營也逐漸成形 (Sing, 2004)。

1989年，中國學生的民主運動以血腥鎮壓告終，在香港牽起了極大反彈，也激化了香港人對前途的憂慮和對民主化的支持 (So, 1999)。英國為了穩定港人信心，推出了連串政策，包括擴大大專教育、訂立人權法、推出居英權計劃 (British Nationality Selection Scheme)、提出興建新機場等。中方對不同措施有各樣的疑竇，中英雙方的矛盾和衝突日增。到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同年10月推出《政改方案》，利用《基本法》的灰色地帶，為香港引入最大限度的民主選舉。此舉引起中國強烈不滿，中英兩國就香港政治問題的糾紛，成為了香港人最關心的議題之一。英方強調的自由民主價值，跟中方灌輸的務實國族主義，建構出兩套截然不同的論述，令既有的民主派和保守派之間的分野更加鮮明 (Sum, 1995)。

內部施政方面，彭定康特別強調政府的透明度和問責性。例如他在立法局舉行答問大會、發表《施政報告》後出席電台節目解答市民問題，又經常巡區了解民情。這些對香港市民和政界來說，都是新鮮的事情，他的政治作風和技巧，把民主、問責等論述帶入香港社會，進一步改變了香港的民意政治(Flowerdew, 1996)。

此外，七十和八十年代急速的經濟發展，也讓中產階級迅速冒起。在西方國家，中產階級是推進民主化的重要力量(Huntington, 1991)。香港當時的「新中產階級」也有一種自覺，認為自己會成為推動政治和社會轉變的主要力量(張炳良, 1988)。於是，以中產專業人士為骨幹的論政團體，如太平山學會、匯點等紛紛出現，為八十年代的論政風氣提供了具體的基礎，同時亦孕育出一批重要的意見領袖，經常就重大議題於媒介發言。

換言之，若香港政治形態在六十年代末出現了一次重大變化，那麼在八十年代中開始，香港就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震盪。但香港人可以發揮實質影響力的空間其實不多，造成了香港人熱心關注，但參與偏低的政治性格(Lau & Kuan, 1995)。

二元權力結構的新聞媒介

從《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至1997期間，港英政府是香港唯一的合法政權，但中國也更積極地透過各種方法介入香港事務。換言之，這段期間的香港進入了所謂的「二元權力結構」(dual power structure)，無名有實地由兩個政權共同參與管治。中英雙方互相拉扯，形成一個沒有「主子」的政治空間，讓香港的傳媒享有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Lee & Chan, 2009a)。

也是在這個歷史時空，以客觀中立及監察政府等自由主義新聞觀作為理念，以本土公眾利益為依歸的專業主義媒體開始在香港成為「主流」。對於這一點，《明報》的歷史有參考的價值。該報章於五十年代創辦時，原是一張極具跨張渲染之能事的小報，創辦人查良鏞以筆名金庸所著的武俠小說，或許是早期《明報》最令人津津樂道的內容。直到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查良庸執筆的社評對大陸作出尖銳的批

評，使《明報》開始成為有分量的論政刊物（張圭陽，2000）。但即使是七十年代，《明報》仍沒有以客觀、中立、專業等自居。事實上，之前提到關信基和劉兆佳在八十年代中分析香港的「低度整合的媒介政治系統」時，仍然指香港新聞界缺乏一種合法性信條（legitimizing creed）（Kuan & Lau, 1988）。

不過，自由主義新聞觀在八十年代其實已慢慢開始成為香港新聞界的信條。在「二元權力結構」下，中立、客觀、平衡等概念獲得了確切的社會和政治意義。當1990年幾位學者首次在香港進行具代表性的新聞工作者調查研究時，結果就發現有八成或超過八成新聞工作者認同中立報導、迅速向公眾發佈資訊、為公眾詮釋事件、監察政府，以及為公眾發聲的重要性（Chan, Lee & Lee, 1996）。這些指標都反映出，傳媒工作者已經意識到和認同新聞專業應有的倫理。

從個人投訴到公共討論

配合越來越政治化的社會環境，吳明林、香港電台資深工作者楊吉璽等多位曾任聽眾節目主持或監製的被訪者都指出，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來電聽眾多了議政，少了投訴和查詢。聽眾節目越來越成為讓市民表達意見的平台。八十年代中開始在商業電台（商台）工作的李碧心形容，面對著移民潮。離開或留下是當時香港人面對的重要問題之一，「決定留下的，彷彿坐在同一條船上，也因此更需要一個平台，讓他們就香港的未來作更多交流、討論」。

往公共討論的轉向到底哪時具體地出現，各個受訪者意見紛紜。但無可否認，聽眾節目的公共面向正在逐漸增強。正如李碧心指出：「以往聽眾詢問何時可以上樓，或者樓下條街很污糟等，其實是為自己問，其他人未必關心，但如果討論教育政策的問題，就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感受到以上所談的社會以至節目氣氛的轉變，港台把其早上的聽眾節目名稱由本來感覺較輕巧的《太平山下漫步》改為《八十年代》，隱含著與「身處大時代」的關聯。當時，由於聽眾節目成為了輿論形成的重要陣地，不少議員和官員都會收聽聽眾節目以掌握民情。當官員不

能準時收聽節目時，有的甚至會致電電台詢問節目內容（陳雲，2009）。

同時，香港的另一間電台，以商業模式運作的商業電台，也開始趕上聽眾節目的發展步伐。整個七十年代，商台並沒有製作以時事為主的聽眾節目，所以，早期電台聽眾節目的發展是由港台主導的。亦由於商台在早期沒有製作聽眾節目，所以，在電台聽眾節目第一階段的發展中，並沒有同類型媒介之間的互動這層次存在。到了八十年代初，商台才製作了《傾吓問吓》。勞浩榮憶述，該節目逢星期一至五在中午播放一小時。正如節目名稱，它的主軸就是讓聽眾「傾吓問吓」，廣東話的「吓」是「一點點」的意思，並有「隨意」的含意，所以節目名稱強調一種輕鬆和非正規的感覺。內容上，跟港台的《太平山下漫步》差不多，《傾吓問吓》主要讓聽眾詢問公屋輪候、補領出世紙等問題。而出席的嘉賓約一半是政府不同部門的新聞官，另外一半則是各區市政局議員，為市民解答地區問題。

至八十年代中，因應社會轉變，節目名稱從《傾吓問吓》改為《自由講自由港》，多了讓市民各抒己見的意味。李碧心曾擔任《自由講自由港》的監製，她憶述，隨著社會氣氛轉變，跟《八十年代》一樣，《自由講自由港》的論政成分也較《傾吓問吓》多。但跟《八十年代》比較，商台的聽眾仍較多詢問日常生活事務，政治討論未及港台成熟。李碧心認為，當時港台是大台，聽眾來電較多，監製也有較多選擇。加上當時的知識分子多是港台聽眾，因此香港電台的論政條件較商業電台好。

由於聽眾意見的論政味道越來越高，主持人應當採取甚麼態度也開始成為一個受關注的問題。當時，香港電台的主持人傾向保持中立，吳明林和另一資深香港電台工作者陳耀華分別以「球證」、「交通警察」自居，以促進討論為主，盡量避免表達自己的意見。很多時候，他們甚至會刻意站在聽眾或嘉賓的對面，以確保中立和促進辯論。不少香港電台的監製和主持甚至會認為，這是香港電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任務的一部分。甚至乎在六四事件發生後，全港市民一面倒反對中共政權的鎮壓行動，香港電台的主持人縱使被聽眾罵「冷血」，也嘗試提出其他觀點，刺激討論（陳雲，2009）。

電視論政「龍門陣」

香港社會的政治化，造就了時事討論節目。在電台之外，九十年代初電視上也出現了一個頗具影響力的論政節目——亞洲電視的《龍門陣》。雖然電視論政節目不是本文分析重點，但《龍門陣》對其後電台聽眾節目的發展有重大影響，不能不在這裏作簡單介紹。

《龍門陣》在1993年10月開始，逢星期四晚上10時30分播出，每星期都會邀請公眾人物，就時事熱話各抒己見，或解釋其政見。由於節目三位主要主持人黃毓民、鄭經翰、陳耀南各具風格，與嘉賓不時針鋒相對，加上嘉賓需要在鏡頭前面對現場觀眾的質詢和批評，《龍門陣》一時成為長期在香港電視市場中處於劣勢的亞洲電視的「皇牌節目」，曾帶來13點收視，即約有80萬人觀看。

可是，亞洲電視在一年多後便終止了《龍門陣》。節目最後一集，大部分曾亮相節目的政界人物都有出席話別。有人問黃毓民，為甚麼電視台要終止節目，黃答：「《文匯報》說我們『親英反中亂港』。」（毛孟靜，1995）無論黃毓民的說法有沒有根據，一個商營電視台突然終止自己最受歡迎的節目之一，確實令人難以理解。由於亞洲電視有一定的中資背景，外界普遍認為，這是電視台礙於政治壓力的決定。

雖然《龍門陣》只播映了一年多，卻間接對電台聽眾節目的發展造成了其中一個關鍵的變化。勞浩榮指出，那一年間，《龍門陣》三位主持人的形象和辯才深入民心，令商台的管理層留意到，原來主持人的口才足以令一個節目升價十倍。因此，《龍門陣》完結後，商台就邀請了鄭經翰及黃毓民加入，分別主持早上和晚上的聽眾節目。鄭經翰更指，他本來不欲參與，嘗試開出「天價」薪酬婉拒，但當時商台總經理俞瑋卻一口答應，可見商台因《龍門陣》的成功，對「名嘴」的市場效應作出了十分正面的評估。廣義地說，《龍門陣》的出現，令電台意識到「商業化」及強調批評辯論的論政節目的存在空間。

在第二階段，聽眾節目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整體的政治社會發展推動著。但跟第一階段不同，這裏指涉的宏觀環境，並非單純是政府的管治方針，而是涉及兩個國家的政治力量，香港政局面對的是更大的不穩定性。第一階段的聽眾節目發展由港台主導。到了第二

階段，商台緊隨其後，也獲得聽眾支持。這或多或少反映出，最上層的政治社會變遷，已經帶動到下層作出相關的反應，社會對電台聽眾節目有了具體的需求，而一些突出的論政節目的出現，啟動了媒體之間的互動，帶動著電台聽眾節目日後的發展。

1995至2004：媒體互動下的烽煙節目

1995年，香港按彭定康的《政改方案》產生了直至現今為止仍是歷史上民主成分最高的立法機關。彭定康強調高透明度的管治風格，再加上中國對香港「港人治港」的承諾，令香港人期望主權移交後可以有一個有具高度問責性的政府。

然而，特區成立後如新機場混亂、「民調風波」等事件，卻一次又一次引發社會不滿。同時，在九七金融風暴後的惡劣經濟環境下，政府以減赤和縮減公務員規模為目標，推行各種改革，也令市民怨聲載道。行政機關的善治一直是政府維持管治正當性的主要途徑(Scott, 1989)。然而，九七後連串風波造成了管治正當性的論述真空(Ku, 2001)。終於，在2003年，政府處理沙士疫情不力，同時在沒有充分諮詢下強推國家安全法，觸發了50萬人在7月1日上街遊行(Lee & Chan, 2011)。

另外，彭定康作為一個專業從政者，具備豐富的媒介經驗和公關手腕，他的管治讓市民感覺到有一定的透明度(Lo, 1995)。但特區政府成立初期，整個行政機關只有特首一人是正式的從政者(politician)，其他主要官員都只是公務員，欠缺專業從政者之政治觸覺和公關手腕。偏偏，特首董建華也不擅長官民溝通，甚至以為擔當特首只需要身居幕後訂定政策，並不需要走到台前回應政治問題(Lau, 2002)。

主權移交前的「二元權力結構」，讓香港的言論自由得以膨脹。然而，以偶遇的權力真空而得的言論自由，畢竟沒有具體基礎。當中國收回香港已成定局，政權也直接和間接地對香港傳媒施加壓力。中國政府不時正面批評香港的新聞機構，讓他們知道中國的底線。另外，隨著香港不少傳媒老闆都在中國有其他生意往來，媒介擁有者與中國利益的連結，造成了香港傳媒的自我審查(Ma, 2007)。香港記者協會

的年報就指，主權移交後十年，有58%新聞工作者感到，業界自我審查和政府控制新聞資訊發放，導致言論自由倒退（香港記者協會，2007）。雖然新聞工作者對專業精神仍然有一定執著，偶爾也會跟高層辯論，以堅持新聞編採應有的倫理價值。但長遠而言，以組織為利益基礎的自我審查趨勢始終難以抵擋（Lee & Chan, 2009b）。

諷刺的是，主權移交後，政府和立法會一直未能在市民心目中建立代表民意的形象，市民期望傳媒可以充當民主政制的代理人，影響政府施政（Chan & So, 2004）。這種複雜的背景，正好讓敢於批評政府的媒介更獲得社會的注視。而在這個階段，電台聽眾節目也發展成為了所謂的「烽煙節目」。

風波裏的批判和監察

隨著環境轉變，電台聽眾節目跟言論自由、批評政府等的關連越來越緊密。九十年代初，香港電台觀察到社會上的論政氣氛越來越強烈，於是在黃昏時段推出了新節目《自由風自由 phone》。楊吉璽憶述，本來他們安排節目在二台播出，希望吸引年輕聽眾論政。後來，他們希望把一台建設成新聞資訊的旗艦，便把《自由風自由 phone》調回一台。節目開始時，引子會用上「言論自由，時代本色」的口號。不過，到了九十年代，「烽煙節目」最重要的代表，始終是由鄭經翰主持的《風波裏的茶杯》。在《風波》的帶動下，電台聽眾節目在制定社會議程和擔當看門狗（watchdog）兩方面的重要性，可說是前所未有地高漲。

剛才提到，到了八十年代末，香港電台仍然是主導聽眾節目的「大台」。無論是致電到節目的聽眾數目，還是聽眾的議政水準，港台均優於商台。因此，《風波》的成功，一方面掀動了聽眾節目在新聞議程中的重要性；同時標誌著，商台逐漸取代了港台，成為具影響力聽眾節目的旗艦。究其成功因素，必須強調的是《風波》能吸引到其他媒介轉載其節目內容，甚至作出跟進報導。相較報章和電視，電台始終不是當今社會受眾最多的媒介。就算在《風波》的高峰期，其聽眾人數也不過是約45萬人而已，⁵與電視台黃昏時間新聞報導近200萬的觀眾人數不能相比。然而報章及電視新聞對電台聽眾節目內容的挪用，卻放大

了該類型節目的社會影響。

主流傳媒願意使用電台節目的內容，一方面是基於政治環境的轉變，使主流傳媒樂得借用在其他媒體渠道出現的對政治權力的批評。但同時，節目製作者本身的策略亦不容忽視，鄭經翰就指出，他的節目比其他節目能有較大影響，主因之一是他並非新聞工作者出身，決定題材時較能夠擺脫報章的既定議程，憑自己的判斷決定題材。他舉例說，有一次他看見報章一則不起眼的新聞，說稅務處要丟棄一批舊電腦，但他覺得稅務處有沒有妥善處理硬盤內的私隱資料可以是一個有趣的議題，便在節目加以討論，並要求稅務處解釋。後來，其他媒體便轉載報導。

鄭經翰這種以個人立場和主觀判斷先行，把社會描繪為黑白二分的做法，跟港台一直強調持平理性，以「交通警」自居的主持風格大相逕庭。值得指出的是，在商台中，《風波》其實是節目部負責的節目，而非新聞或公共資訊部門負責製作，所以《風波》本身有「資訊娛樂」(infotainment) (Lee, 2002) 的性質。然而，在當時特區政府缺乏管治正當性，社會矛盾尖銳的背景下，難以帶動理性的公眾協商，鄭經翰的風格，卻備受歡迎，把港台本來優勢壓了下去。

此外，鄭經翰和當時《風波》的監製勞浩榮強調，節目完結後，鄭經翰和幕後職員都會跟進聽眾的投訴個案，直至問題解決。曾協助《風波》製作的商業電台監製郭志仁亦提到，在幕後有分協助《風波》的，不乏具備社會運動經驗的人士。所以，《風波》並非只是一個電台節目，它有直接介入社會事件的傾向。如在文章開首時提及的，在2003年沙士疫情期間，該節目就發起了送橙、送口罩等運動，成功製造議題。

勞浩榮指出，以往的電台聽眾節目向政府部門作查詢時，普遍都接受由部門的新聞官作出回應。但鄭經翰經常堅持要由局長、處長等最高級官員親自回應。若這些官員身在香港卻推搪要求，鄭經翰便會在節目中不斷痛罵該官員，又會接聽電話，讓其他聽眾補充資料，直至該官員親身解釋為止，勞浩榮形容這是「缺席審訊」。若相關官員不親自回應主持人的查詢，在整個早上接近三個小時被鄭經翰和聽眾反覆批評，其他媒體接力報導，日後可能更難解畫，因此官員只能選擇盡快回應。以勞浩榮所知，當時個別部門甚麼會安排同事負責每早聽

《風波》，以了解當天主持人的題目是否跟他們有關。《風波》這種做法，讓它經常能於早上就獲得來自官方的資訊。其中一個例子是，沙士期間，醫院管理局本來安排了每天下午開記者招待會，公布前一天的死亡人數，但鄭經翰每天早上致電醫院管理局查問死亡人數，消息早上就公開。雖然這種做法也有引起其他同業不滿，但其他媒體都必須以《風波》作為消息來源。

最後，由於節目建立了一種「為民請命」的形象，聽眾遇到不平事，往往會致電《風波》「爆料」。例如，1998年11月，董建華妻子自恃特首夫人，要求坐機艙A1座位的事件，就是由當時在場的機艙服務員主動打電話到節目中「揭發」，因此成為了《風波》的「獨家新聞」。當然，這種個案不只在《風波》出現。在這類型事件中，電台聽眾節目直接取代了其他媒介發掘和報導新聞的功能。《風波》的製作風格、處理和跟進聽眾來電的方式，令它成為了新聞資訊的來源。早上在節目發生的事情，無論是官員意見還是聽眾消息，都有充裕的時間讓其他新聞媒體轉載、跟進，令事件一整天持續在不同媒介流轉。甚至乎，報章在翌日報導相關新聞時，會以電台聽眾的意見，轉載為一般大眾對事件的看法或輿論 (Lee, 2011, 2012)。當《風波》的內容已經超越了一般論政節目，更可能成為獨家新聞資訊的來源時，其他媒介便要更主動留意電台聽眾節目。

風波效應

《風波》為商台帶來可觀的收益。勞浩榮的說法是，扣除節目插播的《新聞專輯》，這個每天兩個半小時節目的廣告收入，佔當時商業電台第一台整條頻道所有廣告收入的三分一至一半。此外，港台的楊吉璽指出，電台業界普遍認為，聽眾早上聽某個頻道的節目，就會一直開著該頻道，很少轉台。若把這種間接影響也計算在內，《風波》為商台帶來的收入會更高。勞浩榮指，正因為《風波》帶來巨大利潤，縱使鄭經翰主持節目的作風曾令到商台被廣播管理局警告，公司都沒有加以阻止。而《風波》停播後，就有報導指商台的聽眾量由45萬跌至15萬，廣告收入也因此急跌，需要員工減薪和縮減人手。⁶縱使這些報導

或有誇張成分，我們仍可見到《風波》作為商台廣告收入來源的重要性。

《風波》的成功，令其他同類型節目不得不作出回應。香港電台邀請了資深主持人吳明林回巢主持《九十年代》。另外，新城電台⁷在1998到2001年間更製作了名為《平息你的風波》的節目。聽眾節目之間的競爭進入了前所未見的白熱化階段。

在內容和風格上，《風波》受歡迎，其他電台節目作出相應轉變，更改了聽眾節目的遊戲規則。以往節目主持人強調要當球證或交通警察，以促進討論為重點。然而，勞浩榮認為，若主持人「面對民主派就變親中，面對親中聽眾就變回民主派」，節目不會受歡迎，因為主持人沒有形象可言。鄭經翰開宗明義支持民主公義。遇到不同意見的聽眾，鄭會直指他們不是，偶爾甚至會掛線不讓聽眾說下去。隨著《風波》的成功，港台的節目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同化」，開始減少強調主持人要兼容並蓄，而要有「個性」。吳明林形容，所謂「個性」，即是主持人要有自己的「core value」，要代表某種普遍價值。

第二，政府和聽眾節目的關係因為《風波》的作風也出現了變化。雖然自七十年代開始，港英政府已經利用電台節目作為官民溝通的橋樑，但那時的官民溝通策略由政府主導。九七後，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不諳官民溝通和政治公關，導致政府在處理訊息發放和面對媒介追問時總是被動（Lee, 2008）。例如，政府官員經鄭經翰的「缺席審訊」才直接回應事件，就令人感到政府反應遲緩，這令高級政府官員知到要隨時準備面對來自傳媒的質詢，或者要更主動地現身電台節目，向公眾解釋政策。

第三，《風波》強調烽煙節目不能關在錄音室內做，而需要與社會運動連結。這種理念，在《風波》結束後，接替的《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和商台另一時段的《左右大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繼承。例如2011年，日本東北九級地震，《左右大局》發起了送水到日本的運動。《晴朗》的監製陳聰強調他們的節目要「落地」，即是說他們要親力親為發掘新聞。資源上，商台也增加了《晴朗》的人手，讓他們跟進個案和整理新聞材料。

第四，在政治理念上，《風波》和另一商台節目，由黃毓民主持的《政事有心人》都針對批評特區政府非民選產生。這兩個節目大受歡

受，令聽眾節目彷彿成為了民主聲音的主要障地。過往一些調查研究就發現，收聽鄭經翰和黃毓民的節目和對民主的支持程度呈正相關。⁸ 同時，對支持民主的聽眾來說，電台聽眾節目甚至有動員的功能：在支持民主派的市民中，收聽聽眾節目和政治參與有顯著的正相關 (Lee, 2007)。某程度上，正因為一些電台節目成為了批評政府和支持民主的輿論障地，縱使節目主持人如鄭經翰往往會挑選一些與他持相反意見的聽眾進行辯論，致電到節目的相反意見其實不多。

個人意見節目的確立

若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的電台聽眾節目是由香港電台主導的話，那九十年代中後的十年，則明顯是商台主導。針對主持人具高度個人風格的電台節目的出現，2000年，香港特區政府發表《電視通用業務守則草擬本及電台業務守則草擬本》，提出了一個新的節目類別，稱為「個人意見節目」，需要「可讓觀眾／聽眾辨別所發表的意見屬於個人意見」，並告示節目主持人和嘉賓立場不代表電台立場。政府提出這個類別，是因為在以往的新聞、時事、公共事務等節目中，雖然主持人對事情也可能有個人意見，但整體上仍然會嘗試平衡各方觀點，很少出現《風波》這一類帶強烈個人立場的論政節目。

可以說，《風波》和《政事有心人》直接促成了政府對電台節目的規管作出轉變。有趣的是，這個規管上的轉變進一步鼓勵電台聽眾節目更具個人風格。特別是對港台來說，「個人意見節目」其實提供了一個免責空間。現為香港電台電台部總監的陳耀華就舉例說，2001年12月港台節目《頭條新聞》把董建華譬喻為塔利班，被廣播管理局以《頭條新聞》並非「個人意見節目」，卻沒有達致持平為理由，發出「勸籲」。此後，港台便把《頭條新聞》列明為「個人意見節目」。陳耀華指，這次事件對港台有一定的啟示，越來越多節目都不問因由先把自己歸類為「個人意見節目」，以保留較大的運作空間。

《風波》的冒起，是各種環境和偶然因素的結果。正如較早部分提到，九七之後，市民不大信任行政機關和政黨，媒介擔起了代表民意的責任。偏偏，主流媒介自我審查的壓力，令電台聽眾節目成為可以

讓其他傳播媒介曲線地批評政府的素材(Lee et al., 2003)。同時，特區政府成立初期，面對媒介時往往處於被動，那便為烽煙節目這種強調實時表達、窮追猛打的節目類型，提供了上佳的發展空間。不過，《風波》的出現和風格並不全由環境因素決定。例如，上文提到《風波》出現前，行內仍然習慣或接受由新聞官來回應查詢，很少堅持由最高級官員親自回應。這種循規(routine)或積習(inertia)，被鄭經翰作為能動者，有意識地不依傳統方式操作所打破，令其他媒介對電台聽眾節目產生了更大的依賴，也令其他類似節目不得不仿效，以致在聽眾節目製作的層面上，形成了新的遊戲規則。同時，《風波》本身及它帶來的效應，亦令政府官員和從政者要有所回應，電台聽眾節目的發展於是對香港的民意政治起了一定的影響。

2004 到現在：「問責表演」平台

20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遊行，是影響香港政治發展的一個關鍵事件(critical event)(Lee & Chan, 2011)。遊行促成國家安全法立法擱置，及兩年後董建華下台。更重要的是，大遊行改變了中央政府的治港方略。由1997到2003年，中國為了堅守一國兩制的承諾，至少在表面上盡量不干預香港事務。特區政府成為中央政府處理香港事務的全權代理人。但七一大遊行後，中國變得較積極地介入，如推動香港與廣東省的經貿合作、在香港全面推行國民教育等，「一國」由被動轉為主動(Tai, 2009)。到2004年初，香港為2007特首選舉及2008立法會選舉的制度安排作出討論，中央政府更一開始就強調，香港的選舉制度並非地區事務，中央要帶領討論。同年2月，新華社刊登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的文章，指香港要由愛國者管治，引發一場「愛國論爭」。到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動解釋基本法，否決2007及2008普選行政長官及整個立法會的可能。

另一方面，2002年，香港政府實行「高官問責制」，局長級官員從此脫離公務員體系，政府開始從社會賢達中招攬人材。這制度一方面回應了社會論述中對問責的重視，另一方面擴大了行政機關的從政者層面。2005年，曾蔭權接替董建華出任特首，在執政初期，他嘗試改

善董建華政府的封閉作風，並聘請資深傳媒人擔任新聞統籌專員，為政府制定公關策略。操作上，政府會給予「友好」傳媒獨家資訊，以換取他們的忠誠，和排擠敵對傳媒機構。此外，每年發表《施政報告》後，曾蔭權都會出席電台聽眾節目。換句話說，相比董建華，曾蔭權政府更重視政府及個人在媒體裏的形象。

在政治結構基本不變的情況下，媒介環境亦沒有大幅轉變。傳媒仍然為市民代言，彌補政制欠民主的缺憾。同時，CEPA簽訂加上中國經濟發展迅速，香港傳媒機構和中國的利益關係更加緊密，隨之而來，香港傳媒自我審查的壓力有增無減。加上政府懂得控制資訊發放以達統戰的作用，也增加了傳媒機構跟政府「合謀」的誘因。

封咪事件與其後的電台聽眾節目

若2003年的七一遊行是香港政治發展的分水嶺，那麼，一年後商業電台的人事震盪則標誌著電台聽眾節目的發展進入下一個階段。2004年，鄭經翰和黃毓民因不同理由跟商台終止合約，後來一度代替主持節目的資深政治人李鵬飛，又在短時間內辭去主持人的工作。李鵬飛直指其「封咪」與政治壓力有關，更指曾有中方官員深夜致電其家，言談中提及他的妻子及女兒。雖然就算真有其事，李鵬飛也有反應過敏之嫌，但他的反應也是在以上提及的愛國論爭的政治低氣壓下才會出現。無論真相如何，連續三位「名嘴」離開聽眾節目的行列，對該類型節目的發展固然有直接影響。

2004年底，商台安排新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接替《風波裏的茶杯》，節目名稱從聚焦社會山雨欲來，改為印象積極，讓人感覺忘記過去。黃昏時段則由《左右大局》取代《政事有心人》，以「有開放平台，無預設立場」為主旨。雖然《晴朗》和《左右大局》都有聽眾參與的元素，但已經不再是典型的、開放讓公眾發表意見的節目。當中，《晴朗》就定位為雜誌式節目，讓聽眾發表意見的時間只佔三至四成。至於《左右大局》，監製陳聰認為，是否接聽眾電話，要視乎聽眾意見能否為節目增值。他要求聽眾有獨特觀點、表達清晰。在過往同樣時段，黃毓民主持《政事有心人》時，雖然監製湛國揚認為主持人的個人演說已經很

精彩，但總會開放一定時間接聽電話。然而，陳聰不認為接電話是節目的必要部分，反而覺得，像黃毓民那樣有個人魅力的主持人，聽他講了一半，就要接入聽眾，未必做到最好的效果。

相對於商台節目「烽煙」元素減少，港台則在「個人意見節目」的免責安排下，製作較有個人風格的聽眾節目。但是，港台仍然較堅持聽眾參與節目作為一個公眾論壇的角色，會安排一定比例的時間讓聽眾分享意見；而來電選取方面，基本上只要聽眾意見對題、表達能力清楚、沒有過分強烈的情緒，工作人員大致上都會以來電先後作安排。現為《自由風》編導的葉冠霖就認為，這做法是他們作為一個公共廣播機構應有的責任。

此外，在整體風格上，雖然商台《晴朗》和《左右大局》都會就政府的施政問題作出批評，但論批評力度和渲染力，均比不上《風波》和《政事有心人》。在另一邊廂的港台，上午《千禧年代》的主持人周融較強調持平和理性，甚至給人傾向建制的感覺，只有下午的《自由風自由Phone》及其主持人吳志森有較強的批判性。

政府官員的「問責表演」

換句話說，在2004年後，電台聽眾節目漸漸遠離「烽煙時期」猛烈批判的風格。不過，聽眾節目仍然是主流媒介的重要新聞來源。這是因為政府高級官員越來越習慣參與電台節目，使這類型節目成為了官員向市民及其他傳媒發聲的平台。

正如上文提到，曾蔭權政府看重媒介策略，在透過控制政府消息發佈統戰傳媒之餘，亦看重媒體形象。這裏需要補充的是，香港政府推行的高官問責制，其實並不包含具體的「問責」制度和程序。歸根結底，由於特首並非民選產生，民意對政治領袖的制約作用始終有限(Chan, 2005)。在這情況下，所謂「問責」，往往是通過媒體而做的一些「表演」(performance)，如平時「落區」體察民情、在犯錯時公開道歉等。而到電台和市民對話，也是近年政府官員的「問責表演」(accountability performance)的主要劇目之一。

在另一方面，電台本身也意識到一個成功的聽眾節目可以達致的

媒介效果。其他新聞媒介每次轉載一個電台節目的新聞，其實等於為電台賣了一次廣告。電視新聞每次播放電台節目的畫面，更會拍攝到電台的標誌。兩者的誘因締結了一種共生關係 (symbiotic relationship)。以政府主要官員或其他重要公眾人物作為嘉賓和主持人及聽眾進行對話的節目開始變得重要。

商業電台和香港電台在1996年及2000年初左右已經推出分別名為《政經星期六》及《星期六問責》的節目，兩者均於星期六早上播放。商台新聞部總監兼《政經星期六》主持人陳淑薇指，商台主要考慮到當時中國快要收回香港，但市民對過渡期及九七後的安排，仍有不少疑問，因此嘗試開闢星期六早上的時段，邀請政府官員出席解答市民問題。但在較早年份，主流傳媒的轉載比例整體而言並不高。在慧科新聞搜索器中，在2001至2003年間，在全香港的報章上，有提及兩個節目名稱其中之一的港聞版或要聞版文章只有75篇。但後來高官出席率日高，以2010年5月至2011年5月為例，35.7%的《政經星期六》有問責官員出席。而香港電台的《星期六問責》則有30.9%節目有問責官員出席。當問責官員難以抽空時，節目亦可能邀約到處長級公務員或常任秘書長擔任嘉賓。結果，在2008至2010年間，在全香港的報章上，有提及兩個節目其中之一的港聞版或要聞版文章就共有316篇。

只要能邀得高官擔任嘉賓，節目往往會成為小型新聞事件。陳淑薇憶述，《政經星期六》初次播放，邀請得當時仍身為財政司的曾蔭權出席，就吸引了大批傳媒採訪，甚至造成混亂。現時，兩個電台都安排節目在較寬敞的錄音室進行，並預留位置讓傳媒做錄影及節目後的訪問工作。這裏，我們可以見到電台節目和主流媒介的合作關係的常規化。

若只計算數量，2004年後聽眾節目並沒有減少，然而像鄭經翰和黃毓民那種強調自由公義等價值，具強烈批判性，同時實踐輿論平台的「烽煙節目」，到2011年時大概只剩下港台的《自由風自由 phone》。而2011年11月，香港電台宣佈不會跟《自由風自由 Phone》主持人吳志森續約，日後節目只會由一位香港電台本身的新聞工作者擔當主持人，負責跟聽眾進行討論，這很可能標示著具個人風格的「烽煙節目」會至少暫時消失。

但若論主流傳媒的關注度，就算是由吳志森主持的《自由風》，亦早已不及《政經星期六》和《星期六問責》。在慧科新聞搜索器中，在2005至2010年間，全香港所有報章的要聞及港聞版共刊登過69篇提及《自由風自由 phone》節目全名的文章，但有提及《星期六問責》的文章則有295篇，提及《政經星期六》的文章更有530篇。可見，《政經星期六》和《星期六問責》這種高官問責表演平台，在2004年後確是在電台聽眾節目中佔了較顯著的位置。然而，也正因為兩者締結的「共生關係」，如李立峰和練美兒(Lee & Lin, 2011)透過對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的方法研究《財政司司長熱線》時指出，節目主持人往往有意無意之間傾向保護政府官員，讓他們免於直接面對來自聽眾的過於棘手的問題或批評。發展至此，聽眾節目似乎有著回歸「官民溝通」的趨向。

總結和討論：電台聽眾參與節目的動態發展

總括而言，上文以香港自六十年代以來的宏觀政治社會發展為基礎，勾勒出過去四十年電台聽眾參與節目的發展。在第一階段，電台聽眾參與節目的出現，基本上是港英政府回應六七暴動出現的正當性危機而改善民生和官民溝通之整體策略的一部分。當時的聽眾節目是功能性的查詢媒介，並沒有明顯的批評或監察功能。到第二階段，隨著過渡期的開展，香港社會急速政治化。論政式的聽眾節目也在這時出現。同時，中英二元權力結構為香港帶來了較廣闊的言論空間，聽眾節目作為公眾議論平台的角色，越來越清晰。到第三階段，從過渡期到特區成立後頭幾年，香港社會仍按政治化的軌跡發展，但董建華政府施政不善，令民怨沸騰。在這背景下，批判和監察功能明顯的「烽煙節目」冒起，其中《風波裏的茶杯》的成功，令其他電台節目也要有所回應。聽眾節目對新聞議程產生較大影響，而主流媒體經常引用電台節目的內容，加大了電台節目的輿論力量，甚至促使廣播管理局提出「個人意見節目」的新節目類別。到了第四階段，「名嘴」封咪，加上香港經濟好轉，民怨緩和，「烽煙節目」的社會影響開始下降。同時，曾蔭權政府改善媒介策略，電台也意識到政府高官對其他媒介的「吸引

力」，兩者互相適應，產生了一種協作關係，使得讓高官表現其問責性的聽眾節目較受重視。

在這總結部分，我們希望基於以上的歷史分析，再進一步討論幾個較理論性的問題。首先，我們在闡釋分析框架時指出，宏觀的政治社會變遷始終有較大的影響力。事實上，在本文所述的第一和第二階段中，重大的宏觀政治社會變遷部分是由於「外力」引發的（如文革影響香港的六七暴動，中英談判後簽署聯合聲明）。在變遷出現之後，民眾之間出現了新的需求（如七十年代開始視政府為訴求對象，和八十年代對前途問題的關注）。同時，社會上多了新的行動者（如八十年代的論政團體），而原有的政治行動者（尤其是政府）與媒體之間的互動亦出現變化。這些變化再進而影響到聽眾節目的發展。可以說，在該兩個階段，變遷基本上是由上而下的影響力促成的。同時，在首兩個階段中，雖然香港電台推動著聽眾節目的發展，但主流新聞媒體仍未對電台節目的內容產生很大的興趣，而商業電台的聽眾節目發展亦較遲緩，媒體之間的互動不多，對電台節目本身的發展並不顯得特別重要，所以我們在分析首兩個階段時對媒體間的互動亦著墨不多。

不過，首兩個階段之間亦有一個差別，就是宏觀變遷與聽眾節目發展的關係的直接程度。在第一階段，兩者的關係非常直接。如果我們視聽眾節目的出現和六七暴動相關，那麼要留意的是，從六七暴動到《電話說心聲》啟播，是短短兩年時間。這種直接而迅速的影響，基礎當然在於當時香港電台仍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直接控制，向公共廣播的轉型只在最初步的醞釀之中，政府和電台之間大概不用有甚麼「磋商」的過程。但到了第二階段，香港前途問題其實早在七十年代末期已被提出，中英談判亦在八十年代展開，但聽眾節目從投訴渠道到議政平台的轉變，卻是較為緩慢的，那是因為在宏觀轉變和微觀的變化之間，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主導推動者。在一個較接近「自然演化」的過程中，不一定有一個確切的歷史轉折點，我們訪問的各資深傳媒人，都不能為電台論政的開始指出一個特定的時間。所以，正如我們之前指出，要全面了解宏觀變遷和特定媒體的發展之間的關係，我們不能忽略其中包括傳媒在內的各社會和政治行動者的作用。

相比第一和第二階段，宏觀變遷對聽眾節目在第三和第四階段中

的演變，有較低的決定性。事實上，從過渡期到回歸，香港的政治社會變遷都只是朝著一個大方向發展。七一遊行引發的中央政府治港策略的演變，在我們的分析框架中看，是一個政治行動者的策略變化多於宏觀政治和社會結構的變化。當然，我們可以說，任何方式的媒體變遷都有其宏觀政治社會條件作為基礎，但如「烽煙節目」的興起背後的社會政治條件—政治化的社會、市民對前途問題的關注、本地民意代表的出現等，不見得是在九十年代中後期才於香港存在。就算是八九民運和1991年香港首次立法會直選，都沒有立即帶來「烽煙」和「名嘴」文化。從亞洲電視製作龍門陣，到其懷疑因政治考慮而停播該節目，到「名嘴」移師電台「開咪」，這過程有著歷史上的偶然性(historical contingency)。

所以，烽煙節目大行其道，雖然不能說沒有宏觀的社會條件作基礎，但實際導致這現象的動因，部分在於個別節目主持人的能動性，部分在於其他電台節目怎樣回應「烽煙」的冒起，部分在於烽煙節目和主流媒介的連繫。這些因素使得一些政治行動者要調整策略，如鄭經翰的「缺席審訊」使官員不得不較主動回應電台節目。換句話說，在第三階段，我們看到一種由下而上的影響力，雖然不一定可以對宏觀結構形成很大的影響，但的確影響到香港的民意政治和公共論述。

所以，從香港的電台聽眾節目發展中可見，不同層次的因素可以在不同歷史時段起著不同程度的作用。結合起來，一種媒體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同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以至偶發因素的介入，使媒體的發展難以預測。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本研究的一些限制。要在一篇文章中書寫一段幾十年的歷史，對某些問題必然只能作簡單的處理。其中兩方面的問題值得在這裏指出，作為補充及日後研究對象。第一是電視論政節目的發展。在這方面，本文只提及亞洲電視的《龍門陣》。事實上，自該節目後，香港的電視台就沒有出現過能引起社會較大迴響的論政節目。在一定程度上，香港電視上論政節目的貧乏，也可說是電台聽眾節目興起的背景之一。環顧歐美，電視製作的觀眾參與節目並不罕見(Livingstone & Lunt, 1994)，為甚麼香港的電視台不嘗試多製作一些讓觀眾參與的論政節目？這大概跟香港電視業的市場結構有關。無論如

何，對電視論政節目的發展作出分析，除了其本身的意義外，應可以補足以上對電台聽眾節目發展的討論。

第二，本文分析著重政治和社會因素，對電台作為一種媒介本身的發展著墨不多。當1969年香港電台推出《電話說心聲》時，香港的商業電視廣播才剛起步，電台仍是一個重要的大眾傳播媒介，但隨著電視及其他傳播科技的發展，電台在過去幾十年就像一個逐漸息微的媒體。而電台作為「小眾媒介」，或跟其有較大空間發展聽眾參與節目有關。有趣的是，互聯網、流動電話等新科技，可能使得電台獲得新的「流動聽眾」。電台本身的未來，當然會影響到電台聽眾節目的發展，需要繼續的關注。

註釋

1. 〈甚麼人訪問甚麼人：鄭經翰——行動型輿論〉，《明報》，2003年11月30日，頁D05。
2. 當然，電台製作的聽眾參與節目不一定跟公共事務有關。但為簡潔起見，除非特別註明，「聽眾節目」指的是由電台製作並容許市民參與的公共事務討論節目。
3. 由於新界屬鄉郊地區，有著原住民傳統，因此港英政府在新界採用跟市區不同的地方行政制度。理民府 (District Office) 於1907年成立，主要負責徵收地稅、管理土地、平衡香港法律與中國傳統習俗的矛盾、聯絡地區氏族等。六七暴動期間，新界的情況相對穩定，港英政府認為這是理民府工作的成效，故開始在市區推行類似的行政制度 (Tsang, 2004)。
4. 資料來自深度訪談。在文章以下部份，凡引述個別傳媒工作者而沒有特別註明出處時，資料即來自為本研究而進行的深度訪談。
5. 〈收聽率廣告跌傳放盤〉，《星島日報》，2005年7月3日，頁A02。
6. 同上註。
7. 新城電台於1991年啟播，成為香港的第三個廣播電台。
8. 這可見於本文第一作者於2004年所進行的調查研究。另外，在一次於2010年3月進行的調查研究中，收聽電台聽眾節目和對民主發展的支持程度亦呈顯著的正相關。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1967)。《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香港：政府印務局。
- Yijiuliuliuonian jiulong saodong diaocha weiyuanhui (1967). *Yijiuliuliuonian jiulong saodong diaocha weiyuanhui baogaoshu*. Xianggang: Zhengfuyinwuju.
- 毛孟靜(1995)。〈最後一夜〉，載《傳媒人。傳媒事》(頁32)。香港：明窗出版社。
- Mao Mengjing (1995). *Zuihou yiye*. In *Chuanmeiren, chuanmeishi* (p. 32). Xianggang: Mingchuang chubanshe.
- 李立峯(2007)。〈策略互動、文化共向和九七回歸後香港新聞自由的發展〉。《傳播與社會學刊》，第三期，頁31-52。
- Li Lifeng (2007). *Celue hudong, wenhua gongxiang he jiuqi huihou hou xianggang xinwenziyou de fazhan*.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3, 31-52.
- 陳雲(2009)。《一起廣播的日子：香港電台八十年》。香港：明報出版社。
- Chen Yun (2009). *Yiqi guangbo de rizi: Xianggang diantai bashinian*. Xianggang: Mingbao chubanshe.
- 馬嶽(2010)。《香港政治：發展歷程與核心課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 Ma Yue (2010). *Xianggang zhengzhi: fazhan licheng yu hexin ke ti*.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daxue yataiyanjiusuo.
- 韋佩文等(2004)。《從一九八二年說起：香港廣播七十五年專輯》，香港：香港電台。
- Wei Peiwen deng (2004). *Cong yijiubaernian shuo qi: Xianggang guangbo qishiwunian zhuanji*. Xianggang: Xianggang diantai.
- 張圭陽(2000)。《金庸與報業》。香港：明報出版社。
- Zhang Guiyang (2000). *Jinyong yu baoye*. Xianggang: Mingbao chubanshe.
- 張圭陽(2006年10月)。〈初探香港電台公營廣播之路〉。《傳媒透視》。上網日期：2011年10月5日，取自http://rthk.hk/mediadigest/20061016_76_121165.html。
- Zhang Guiyang (2006). *Chutan Xianggang diantai gongxing guangbao zhi lu*. *Chuanmei toushi*. Retrieved October 5, 2011, from http://rthk.hk/mediadigest/20061016_76_121165.html

- 張炳良 (1988)。〈新中產階級的發起與政治影響〉。載馬國明 (編)，《階級分析與香港》(頁9-26)。香港：青文書屋。
- Zhang Bingliang (1988). Xin zhongchan jieji de faqi yu zhengzhi yingxiang. In Ma Guoming (Ed.) *Jieji fenxi yu Xianggang* (pp. 9-26). Xianggang: Qingwen shuwu.
- 香港記者協會 (2007)。《空間收窄：回歸十年以來的香港言論自由》。上網日期：2011年7月10日，取自 <http://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1-619&lang=zh-TW>
- Xianggang jizhe xiehui (2007). *Kongjian shouzhai: Huigui shinian yilai de Xianggang yanlunziyou*. Retrieved July 10, 2011, from <http://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1-619&lang=zh-TW>
- 梁麗娟 (2007)。〈處於十字路口的公共廣播：政治與香港電台的轉變〉。《傳播與社會學刊》，第三期，頁89-113。
- Liang Lijuan (2007). Chuyu shizilukou de gonggong guangbo.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3, 89-113.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lbarran, A. B. (2002). *Media economics, 2nd edition*. Ames, Iowa: Iowa State Press.
- Bagdikian, B. (2000). *The media monopoly, 6th edition*. Boston: Beacon.
- Baker, H. D. R. (1983). Life in the cities: The emergence of Hong Kong man. *The China Quarterly*, 95, 469-479.
- Carey, J. (1993). The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Between the modern and postmod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7, 1-21.
- Couldry, N., & Curran, J. (eds.) (2003). *Contesting media power*.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Chan, J. M., & Lee, C. C. (1984). Journalistic paradigm on civil protests: A case study of Hong Kong. In A. Aron and W. Dissanayake (Eds.), *The news media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p. 249-276). Boulder: Westview.
- Chan, J. M., & Lee, C. C. (1991).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NY: Guilford.
- Chan, J. M., & Lee, F. L. F. (2007). Media and politics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An introductio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127-133.
- Chan, J. M., & Lee, F. L. F. (2011). The primacy of local interest and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A survey study of journalists. *Journalism*, 12, 89-105.
- Chan, J. M., & So, C. Y. K. (2004). The surrogate democracy function of the media: Citizens' and journalists' evaluations of media performance. In S.K. Lau et al. (Eds.),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pp. 1249-1276). Hong Kong:

-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 Chan, J. M., Lee, P. S. N., & Lee, C. C. (1996). *Hong Kong journalists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Hong Ki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 Chan, P. C. Y. (2005).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 4(2), 477–506.
- Cheung, A. B. L. (1997). Reform in search of politics: The case of Hong Kong's aborted attempted to corporatise public broadcasting. *As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2), 276–302.
- Cheung, G. K. W. (2009). *Hong Kong's watershed: The 1967 riot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Croteau, D., & Hoynes, W. (2001). *The business of media*. Newbury Park: Pine Forge.
- Flowerdew, J. (1996).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Language in Society*, 25(4), 557–586.
- Gans, H.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Pantheon.
-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2). Hong Kong: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 Hughes, R. (1968). *Hong Kong,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London: A Deutsch.
- Huntington, S. P. (1991). *The third wav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Jamieson, K., & Cappella, J. N. (2008). *Echo chamb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u, A. S. (2001). The “public” up against the state: Narrative cracks and credibility crisi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8(1), 121–144.
- Kuan, H. C., & Lau, S. K. (1988). *Mass media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e for Hong Kong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ai, C. P. (2007). *Media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 Lau, S. K. (1982). *Th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Lau, S. K. (2002). Tung Chee Hwa's governing strategy: The shortfall in politics. In S. K. Lau (Ed.), *The Tung Chee-Hwa administration: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on* (pp. 1–40).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Lau, S. K., & Kuan, H.C. (1995). The attentive spectato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East Asia*, 14(1), 3–24.
- Lee, C. C. (1985). Partisan press coverage of government news in Hong Kong. *Journalism Quarterly*, 62, 770–776.
- Lee, C. C., & Chan, J.M. (1990). Government management of the press in Hong Kong. *Gazette*, 46, 125–139.
- Lee, F. L. F. (2002). Radio phone-in talk shows as politically significant infotainment in Hong Kong.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7(4), 57–79.
- Lee, F. L. F. (2007). Talk radio listening, opinion expression and political discussion

- in a democratizing society.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1), 78–96.
- Lee, F. L. F. (2011). *Remediating prior talk and constructing social dialogue: Newspaper coverage of public affairs talk radio discussions in Hong Ko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Boston, USA, May 2011.
- Lee, F. L. F. (2012). The life cycle of iconic sound bites: Politicians' transgressive utterances in media discourse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4(3), 343–358
- Lee, F. L. F., & Chan, J. M. (2009a). Making sense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A review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Hong Kong. In L. Willnat & A. Aw (e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sia* (pp. 9–42). London: Routledge.
- Lee, F. L. F., & Chan, J. M. (2009b). The organizational production of self-censorship in the Hong Kong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4, 112–133.
- Lee, F. L. F., Chan, J. M., & So, C. Y. K. (2003). *Contextualizing political talk radio in Hong Kong: A comparison of citizens' and journalists' view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3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an Diego, California.
- Lee, F. L. F., & Lin, A. M. Y. (2011). Officials' accountability performance on Hong Kong talk radio: The case of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otline. In M. Ekstrom & M. Patrona (eds.), *Talking politics in broadcast media* (pp. 223–24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 Lee, B. K. (2008). The HKSAR Government's PR sense and sensibility: Analysis of its SARS crisis management. In J.M. Chan & F.L.F. Lee (eds.), *Media and politics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pp. 68–81). New York: Routledge.
- Livingstone, S., & Lunt, P. (1994). *Talk on television*. London: Routledge.
- Lo, S. H. (1995).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Hong Kong: The role of Governor Patten. *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 10, 205–220.
- Ma, N. (2007). State-press relationship in post-1997 Hong Kong: Constant negotiation amidst self-restraint. *The China Quarterly*, 192, 949–970.
- Ma, E., & Chan, J. M. (2006). Global connectivity and local politics: SARS, talk radio, and public opinion. In D. Davis and H. Siu (eds.), *SARS: Rece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ree Chinese Cities* (pp.19–46). London: Routledge.
- McChesney, R. (1999).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Murdock, G. (1982).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control of 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 In M. Gurevitch et al.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pp.118–150). London: Methuen.
- Page, B. I., & Tannenbaum, J. (1996). Populist deliberation and talk radio.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6(2), 33–54.
- Scott, I. (1989).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Skeldon, R. (ed.) (1995). *E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Sing, M. (2004). *Hong Kong's tortuous democrat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 Sit, V. (1981). Post-war population and its spatial dynamics. In V. Sit (Ed.), *Urban Hong Kong* (pp. 2–25). Hong Kong: Summerson Eastern.
- So, C. Y. K., & Lee, A. Y. L. (2007). The radio phone-in talk show as the people's council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In J.Y.S. Cheng (ed.),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its first decade* (pp. 827–852).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So, A. (1999).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um, N. L. (1995). More than a 'war of words':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struggle for dominance during the recent 'political reform' period in Hong Kong. *Economy and Society*, 24(1), 67–100.
- Tai, Y. T. B. (2009). An unexpected Chapter Two of Hong Kong's constitution: New players and new strategies. In M. Sing (Ed.),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pp. 220–245). London: Routledge.
- Tsang, S. (2004).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New York: I.B. Tauris.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New York: Free Press.
- Zaller, J., & Hunt, M. (1994). The rise and fall of candidate Perot: Unmediated versus mediated politics—Part I.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1, 357–390.
- Zaller, J., & Hunt, M. (1995). The rise and fall of candidate Perot: Unmediated versus mediated politics—Part II.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2, 97–123.

本文引用格式

- 李立峯、鄧鍵一 (2013)。〈社會變遷、媒體互動，以及電台聽眾參與節目在香港的演變〉。《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24 期，頁 23–60。